

科学社会主义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与突破

李东明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历史性成果,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 21 世纪的重大实践创新。要深刻理解其历史方位与理论价值,必须将其置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谱系中进行整体性把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宏观视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实现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突破:第一,开创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发展新范式,实现对资本文明的本质性超越;第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土化路径,实现对苏联模式的历史性超越;第三,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第四,回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难题,贡献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科学社会主义逻辑的当代彰显,也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时代宣言。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历史周期率”“发展悖论”“文明冲突”等世界性难题的创造性应答,昭示着社会主义作为人类进步事业的生命力与引领力。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创新突破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8-0013-10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具有标识性、独创性意义的概念、话语、理论、智慧和方案,已经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理论界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风险挑战以及重大意义等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上,国内理论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无论是在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上,还是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深度、研究方法以及学科领域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为后续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式现代化对塑造世界现代化新格局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国外理论界、左翼政党和媒体等也都高度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大致从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风险挑战和影响因素、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影响和世界意义等方面展开了解读和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海外视角和素材。虽然,基于阶级立场、意识形态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西方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误解,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意义及其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

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阐释,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的比较优势研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其中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¹³诚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道路上的具体化,拓展于新时代以来的伟大社会变革,是人类历史上非西方国家不通过

收稿日期:2024-03-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思想与实践研究”(22BKS015)。

作者简介:李东明,男,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林 541001)。

资本主义制度而走向现代化的成功案例,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现代文明这一历史性课题作了系统性思考和创造性回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意义尤为重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2]。这就要求我们,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宏观视阈之中去认识,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和意义。

一、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发国家 发展路径:对资本文明的 本质性超越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带来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社会交往普遍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劳动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异化。这种异化的文明被马克思称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3]¹²⁰。恩格斯也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灵魂是“鄙俗的贪欲”,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4]¹⁹⁴。鉴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的诸多弊病及其负面影响,如何超越资本文明,探索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便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探索的重点。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3]⁷²⁸这里所提到的“道路”指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如果继续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最终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将失去在俄国村社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宝贵历史机遇,而且也必将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灾难性的波折”。如果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或许能够“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3]⁷²⁸,从而摆脱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对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前提条件等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他们的理论指向并不只是俄国,而是普遍存在的后发国家发展道路问题。遗憾的是,他们未能亲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只是对超越资本文明的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点题”。这个历史性难题,仍有待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破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启了超越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和国家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列宁去世后,苏联虽然也进行了长期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以改旗易帜的演变“跑题”告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真正实现了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历史性难题的创造性求解。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探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转向,同马克思当年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目的一样,都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从历史维度看,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裹挟的近代中国,面临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等“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诸多现代化救国方案均行不通的情况下,致力于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社会主义便和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进入了同向同行、交叠砥进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不仅包括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逐步实现,而且包含根本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形态的跃迁,即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更高级别社会形态、文明形态的跳跃式发展和本质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创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先进政权和制度优势逐步实现文明反超的现代化新路,不仅极大压缩了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工业化历程的时间,而且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发展路径,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的本质性超越。

1. 中国式现代化以创新性打破资本文明的唯一性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人类对西方现代化即资本文明的理论迷思和路径依赖,展现出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认为现代文明起源于欧洲,现代化的成功案例和有益经验也都出自西

方国家,因此强调除了具有唯一性、单向性、绝对性的西方模式外,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别无他途。这就导致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为西方现代化或西方化。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更是以一种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傲慢姿态抛出了“历史终结论”,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不二法门”。这种观点的流行,在导致人们对于现代化认知产生偏差的同时,也限制了各国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能。然而,任何阻遏人类创新的图谋都是徒劳的。须知,马克思当初之所以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正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够探索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此打破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可逾越的神话。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创、推进和拓展,用事实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资本主义制度绝非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蓝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

2.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性超越资本文明的逐利性

“资本愈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工人所受的迫害也愈厉害。”^[5]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文明,追求的是资本增殖和财富积累,却遮蔽了人存在的意义世界,造成了人的异化和人的价值虚化。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的文明必然被自由人“联合体”^[6]所取代,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最高价值标尺。如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迈克尔·邓福德所指出的,与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逻辑的文明产物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创新的、生态的、精神丰富的、公平的,并且能够丰富全体人民的生活”;中国的自身发展是“社会主义模式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是以政治(即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主导而不是以资本为主导”,因而“它有能力有效地调动其人民的力量”^[7]。

诚然,内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人民的主体性,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价值指向上的超越。无论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深

刻阐释,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的论述,其核心意蕴都高度一致、一以贯之,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立场。这些重要论述,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了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和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人民所应享有的广泛价值权利。如果说西方现代化“只见物不见人”,造成“物质主义膨胀”和人的“精神贫乏”,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便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理性复归,强调人民作为社会历史主体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价值指向上以人民性超越资本文明的逐利性。

3. 中国式现代化以全面性超越资本文明的片面性

资本文明受资本逻辑支配,只代表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文明指向具有片面性,主要表现为过度追求资本增殖和经济利润,不仅忽视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无暇顾及对社会全面进步的促进。这就决定,资本文明只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片面发展,其他文明则被“物质主义”的膨胀所掩盖。但对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不可避免地会触发系统性的社会危机,导致资本文明陷入“现代性悖论”和“现代性困境”中而无法自救。英国“费边社”理论家锡德尼·维伯和比阿特里斯·维伯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劳动者的贫困、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平等、个人自由的悬殊、自然资源破坏、资本主义制度下道德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战争破坏等,说明资本主义文明在不可阻遏的时代变迁中正发生“腐蚀性的崩溃”,并由此得出结论称,“正像古代苏莫尔人的、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的文明已经消逝一样,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文明(它和过去的文明一样是会死亡的),正在我们的眼前崩溃”^[8]。

与资本文明片面追求利润增殖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注重文明发展的全面性,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文明内涵,形成了“五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模式。这种全面性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来说,是流动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来说,是建设性的;对于片面的西方现代性来说,是完整的;对于西方的‘现代性之殇’来说,是反思的、批判的、革命的”^[9],是对资本文明片面发展模式的扬弃和全面发展模式的创造性探索,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

4. 中国式现代化以可持续性超越资本文明的断裂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新陈代谢”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也就是说,人只有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才能维持正常的劳动和生活,人和自然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和谐共生的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对立的分裂,使得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1],打断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可持续循环的自然过程,从而出现诸如森林破坏、土壤退化、气候恶化、空气和水污染、生产排泄物等一系列新陈代谢“断裂”的问题。这不仅是指资本文明时代的生态问题,而且意味着一种社会危机,因为这种断裂正在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蕴含着对资本文明非生态性、反生态性之病症的矫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12]。中国式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从根本上克服并有效矫正了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由资本逻辑主导、片面追求“资本盈利最大化”所必然导致的生态代谢断裂问题,从而深刻重建并稳固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范式。

5. 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平性超越资本文明的扩张性

资本文明以殖民主义为基本定向,将世界构建成为“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关系。具言之,在经济层面,西方国家为获得巨大利润,对落后国家输出“过剩”资本、倾销商品、剥削廉价劳动力、掠夺自然资源等,导致南北经济关系严重失衡和贫富差距愈发悬殊;在文明层面,西方国家以一种“西方优于东方”的天然优越感大力推行文化扩张政策,软硬兼施迫使其他发展中国家接受资本文明,进而谋求文化霸权;在国际关系层面,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公然掠夺弱者”^[13]。这种靠对外殖民掠夺铺就的资本文明之路,导致国家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关系,而这些不平等关系的积累使得世界处在更大的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起源于中华民族反西方殖民与侵略的历史事实,厚植于崇尚“和合”友好的中华文明底蕴,形成于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具体实践,凸显和平发展的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4]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扬弃了资本文明依靠暴力掠夺实现原始积累的发展范式,开创了一条以和平为内核的文明进阶新路径,走的是一条合作交流、共享共赢、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

二、后发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路径创新:对苏联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超越

社会主义首先建立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如何不断厚植现代化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的问题。对此,列宁开创了一条“先革命后建设”,即利用先进政权和制度优势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所需物质和文化条件的现代化新路。这条新路提出了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战略构想,即以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发展主张、以利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文化革命”来造就社会主义新文化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思想。应该说,列宁实际上是找到了一条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但列宁去世后,是继续走列宁所找到的现代化道路还是另辟蹊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党内为此展开了激辩。经过诸多现代化方案的激烈角逐和反复较量,斯大林提出的现代化方案最终胜出并随后成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苏联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苏联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在苏联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苏联借助这一模式在短时间内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建立了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并打败纳粹德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这一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包括不重视人民生活改善、权力高度集中、排斥市场和商品经济、自我封闭等。这种畸形片面的现代化模式不仅扼杀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而且被固化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唯一正确道路,

从而限制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探索和多样化选择。

鉴于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负面影响,如何改革苏联模式、超越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不仅在苏联先后有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改革,而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出现了要求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就意识到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更是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要求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单一模式的束缚,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促进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探索和多样化选择。但不同的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始终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和束缚,甚至最终走向了改旗易帜的道路,而中国则基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重新定位和自主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22},进一步明晰、审视和分析“中国特色”,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纵览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式现代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认知窠臼,它显然“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484}。中国式现代化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于中国社会走得通、行得稳的成功案例,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适合中国国情和满足了人民需要,作为一种后发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创新,实现了对苏联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超越。

1. 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立自主突破了苏联“单一模式”的束缚

从道路选择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单一模式”的迷思,形成了“走自己的路”的鲜明特质和道路自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习惯用单一的现代化道路或现代化模式,即将苏联现代化道路作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评判标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道路的多样性和选择的可能性。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单一化的认识因其理论上的错误而带来了实践上的危害。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5]261}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16]494}。

基于对苏联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与批判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鲜明地确立了“走自己的路”这一根本特质,展现出高度的道路自信与历史自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不仅是对本国发展路径的卓越探索,更在深层次上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了重大突破:它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束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单一模式”迷思,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摆脱教条化困境、开辟多样化发展新境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2.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取代了苏联发展道路的“国家优先”

从发展理念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苏联片面追求“国家优先”而轻视增进人民福祉的现代化之路,突出了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开始的全新探索,但它以牺牲农民利益和限制国民生活改善为前提,片面追求工业化、国家的“绝对安全”甚至是同美国的军事争霸,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种畸形发展的现代化,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积重难返,最终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引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追求的是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的现代化,因而能够根基稳固、步履坚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17]

3. 中国式现代化的与时俱进超越了苏联发展道路的僵化守旧

从生机活力看,与时俱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僵化守旧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表现出极强的务实性和灵活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

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17]但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却表现出明显的僵化保守、因循守旧等特征,即否定商品经济、不能正确看待资本市场、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形式、未能建立起自我发展的改革体制机制等,因为不能适应时代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最终失去了生机活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则开创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拓展于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仅破除了那些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影响社会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而且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探索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新型现代化生产方式、利用和驾驭资本等能够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方法路径,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显然,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突出鲜明的独立自主特性,是契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道路”;突出发展方向的人民性,是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道路;突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性,是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顺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探索出后发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

三、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成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现代化领域的新诠释。从现代化的认知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实践的深刻变革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阐述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能动地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1. 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领导力量,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论著中反复阐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于推动工人运动、掌握同资产阶级对抗的政治主动、实现人类解放等方

面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列宁更是强调“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斗争”^[18]。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才能把前途和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不偏向、不变色,行稳致远。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得以不断纠“左”防右,排除“全盘苏化”“全盘西化”,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巩固执政基础、优化领导机制,以党的先进性和强大组织力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这一实践路径不断丰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为规避类似苏联因弱化党的领导而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历史错误提供了根本保障。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和最终成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2]

2. 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国特色”的突出特性和独立自主的道路自觉,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示: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在文明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多样性。诚然,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并不存在固定“样板”或统一标准,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经验而迷失自己的做法,势必会在变幻无常和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中折戟碰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19]从“走别人的路”到形成“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自觉,在历史省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并成功开辟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才使得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大踏步跟上了时代。

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15]2-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1]77}。这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和独

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彰显道路上的高度清醒和高度自信,在道路选择问题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3. 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强调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现实地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则的重大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社会生产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正是将人的全面发展原则付诸现代化实践,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他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16]407}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到现代化实践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基于对现代化和人的发展两者辩证关系的深刻省思,中国共产党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始终站稳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22},在现实中推动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中生动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4. 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确立在改革中深化、在开放中发展的现代化理念,深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601},如果封闭僵化、孤芳自赏,必将被时代和历史所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启发我们,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化潮流都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必须放到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和把握。在现代化实践的深刻变革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发展的关系的深刻省思,明确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起

到决定性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0]。中国式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中得以推进,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开放,不仅在理论上澄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而且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刻变革中能动地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5. 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有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精神。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斗争中得以不断发展的,斗争精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明理论品格和精神特质。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成立,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成长奋起,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斗争的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16]257}。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变革中,面对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和接踵而至的风险考验,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斗争精神的发扬,旨在涵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的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对于打开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新天地”,特别是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2]的重要意义,赋予斗争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

诚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伟大的开创性事业,在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诸多艰难险阻和风浪考验,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关键时刻能够站得出来、冲得上去,才能掌握主动、赢得优势,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四、书写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答卷”:对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原创性贡献

面对现代化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

化以举世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一份为世界大变局注入正能量的“中国答卷”,成功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版本、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具有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的世界意义。

1. 为人类社会摆脱现代化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回答了世界百年变局之中“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社会摆脱现代化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成功回答了后发国家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何走向现代化、如何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文明反超、如何保持民族独立、如何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以及人类如何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成功破解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证绝大多数人享受现代化成果、如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如何实现物质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相协调、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何规避西方现代化零和博弈和恃强凌弱的霸权路径等诸多人类社会难题。

从理论形态层面讲,中国式现代化孕育形成的关于现代化前进方向、本质要求、指导原则、价值导向、实现路径、世界定位等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现代化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从实践形态层面讲,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形成的道路自觉、思路方法、艺术策略、文明形态、发展模式等有助于人类社会摆脱现代化困境。正如英国资深中国观察家基思·贝内特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将深刻地改变甚至彻底改变全球社会和经济,从而为那些仍然面临发展问题的国家和人民提供改变的前景和可能性”^[21]。

2. 为人类社会更好走向现代文明贡献了中国版本

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现代性特征,为人类文明形态贡献了社会主义要素和中国版本。“现代性多用于有关现代化的评价,一般指对于现代化过程中造就的现代社会根本特征与表现形态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概括,大致包括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核心要素及其对新的文明秩序的追寻等共同内容。”^[22]但各个国家由于存在自然条件、发展起点、现实基础、文化传统等不同,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也不尽相同。西方现代化的基础是资本,因而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必然是“人的生产关系的物化”、人对物的依赖以及人的劳动和精神的

双重异化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实践的具体形态,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化版本,是“中国道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具象投射与实践展开。这种植根于社会主义制度基因的质的规定性,使其在现代化实践中必然孕育出迥异于西方模式的新现代性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从而解开了西方“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撕裂和内耗的“现代性死结”,实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时代探索,也是对资本逻辑宰制下物质主义膨胀和人的精神异化等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积极反应与有效克服;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相统一,突出现代化过程、方向、价值和目标的人民性,从而破解了西方社会将社会进步同人的发展相剥离、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割裂、过度强调工具理性而导致人的“异化”“物化”的“现代性困境”,如此等等。这些新的现代性特征,既是社会主义要素的世界性彰显,更是中华文明在淬火重生后对“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纪应答。

3.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世界百年大变局下的“两制”关系问题,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刻演变和文化多样化、信息化持续推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实现了自主性和世界性的统一,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联系、区别和共存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虽然是中国道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但同时也指向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具有目标的一致性,那就是在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要摒弃冷战和阵营对抗旧思维,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阶级立场差异,携手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文明形态的资本逻辑及其在“两制”关系态度上所表现出的狭隘性,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明形态格局,为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塑造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凝聚应对全球挑战共

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贡献了中国方案,为携手共建更加美好世界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4. 为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彰显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价值性,为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历史终结论”,也即“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瞬时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观点。这种论调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挫、陷入低潮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却严重低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动摇了世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但实际上历史并未终结,中国顶住了那场剧变带来的“连锁反应”和来自西方社会的舆论压力,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扭转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颓废态势,以至于许多海外学者都对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表征的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给予了高度肯定。

塞·罗·盖尔费斯坦以《社会主义在中国还活着》为题撰文指出,中国现在已经“提出了振兴社会主义的方案”,尽管西方在苏联解体之后大肆宣扬社会主义的死亡,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但中国令人不禁想到了法国喜剧《骗子》中的那句名言,“你杀死的人似乎身体健康”^[23]。卡洛斯·马丁内斯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成为“新常态”,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他指出:“中国不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今时代的体现:资本主义早已耗尽了从根本上推动人类进步的能力,因此未来在于社会主义。”^[24]

显然,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价值追求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的全球影响力和感召力也必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逐渐暴露和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格局的不断拓展而愈发凸显。

结 语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所实现的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绝非局部性调试,而是具有文明史意义的系统性超越与范式性贡献。其深刻性集中体现于四重维度的历史性跨越:在路径选择上,跳脱“资本逻辑宰制”的发展窠臼,构建以人民性为内核的现代化新范式,为后发国家破除“发展依附性”魔咒提供非西方化方案;在制

度建构上,突破苏联模式封闭僵化的体制困境,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型治理体系,重释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性要素的兼容逻辑;在理论创新上,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发展理念”等具象化战略体系,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认识的革命性跃升;在文明贡献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治理伦理,通过脱贫攻坚、碳中和实践树立发展正义新标杆,为人类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智慧。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规律的科理论体系,其生命力恰恰在于拒绝教条化宿命。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25]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印证,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板,其实现形态必然深植于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实土壤与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枢纽,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先进本质与时代命题创造性融合,构筑起三位一体的理论创新基座,有力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转化为富有成效的现代化强国实践,向世界展现出更为璀璨的发展图景,不仅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而且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曲折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中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光明前景。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仍是“现在进行时”。面对逆全球化浪潮、技术伦理挑战、人口结构转型等风险,中国式现代化亟须在理论完善、制度定型、文明对话等方面深化探索,惟其如此,方能最终凝练为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的文明新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史上镌刻下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明标识。这既是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纪承诺,也是社会主义文明重获历史主动权的时代宣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1).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6.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 [7] DUNFORD M.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1949-2022[EB/OL]. (2023-10-23)[2025-03-01].<https://socialistchina.org/2023/>

- 10/23/chinas-development-path-1949-2022/#more-5088.
- [8] 维伯 S, 维伯 B. 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M]. 秋水,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
- [9] 陈曙光. 中国道路开启现代性文明的新形态[J]. 江海学刊, 2020(3): 46-49.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9.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19.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4.
- [13] 列宁全集: 第 2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48.
- [14]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3-16(1).
- [15]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7]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N]. 人民日报, 2023-03-16(2).
- [18] 列宁全集: 第 3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55.
- [1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 30.
- [20]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12-27(2).
- [21] BENNETT K.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directed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EB/OL]. (2023-05-31) [2025-03-02]. <https://socialistchina.org/2023/05/31/chinas-modernization-is-directed-toward-common-prosperity-for-all/>.
- [22] 赵义良.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3): 47-59.
- [23] GELFENSTEIN S R. Socialism is alive in China[EB/OL]. (2022-11-11) [2025-03-05]. <https://Socialistchina.org/2022/11/11/sergio-rodriguez-gelfenstein-socialism-is-alive-in-china/#more>.
- [24] MARTINEZ C.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modernisation[EB/OL]. (2023-09-29) [2025-03-05]. <https://socialistchina.org/2023/09/29/capitalist-and-socialist-modernisation/>.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90.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Li Dongming

Abstrac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historic achievement of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king a major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To deeply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theoretical value, it must be grasped holistically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world-significant innovat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first, it has pioneered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for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in non-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realizing an essential transcendence of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second, it has explored a localized path fo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chieving a historic transcendence of the Soviet model; third, it has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fourth, it has responded to the common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contributing Chinese solutions to addressing global governance dilemma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both a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 of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an era declaration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essence, it 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reative response to such global challenges as the "historical periodicity", "development paradox", and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era", demonstrating the vitality and leading role of socialism as a cause of human progress.

Key words: scientific socialism;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责任编辑: 弈 寒